

China's Commercial
Revolution
from 16 to 18
Century

16~18世纪

中国 商业 革命

16~18世纪中国发生了商业革命，其体现是国内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发展导致国内市场规模形成，以及海外贸易的扩张。其时商业革命产生了重大的社会经济效应，加速城市化进程，商人社会地位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不过这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之所以未能完成，一是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失衡，二是封建政权对商业的摧残压制，三是商业资本控制生产路径狭窄，四是没有发生资本原始积累，商业革命未能完成，不能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不过从世界范围看，资本主义萌芽没有直接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非中国独有，荷兰也是如此。

主 编/唐文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China's Commercial
Revolution
from 16 to 18
Century

主 编/唐文基

16~18世纪

**中国
商业
革命**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目 录

绪 论	16~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萌芽.....	1
第一章	16~18世纪中国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新格局及其产生的经济环境.....	26
第一节	16~18世纪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新格局.....	26
第二节	几大经贸区出现,全国性大市场形成.....	30
一	江南经贸区.....	31
二	珠江三角洲经贸区.....	44
三	长江上中游经贸区.....	49
四	华北经贸区.....	52
五	西北经贸区.....	57
六	全国性大市场格局的最终形成.....	66

● 16~18 世纪中国商业革命

第二章 海外贸易的扩张，中国是当时世界范围	
商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70
第一节 闽粤海商私人海外贸易的扩张	70
第二节 17 世纪中国商业革命先驱	
——郑成功海商集团	80
第三节 对外贸易港口数量增加	85
第四节 中国是世界范围商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92
第三章 16~18 世纪中国货币问题与	
商业革命	98
第一节 16~18 世纪中国的白银货币	98
一 白银成为市场主币	98
二 白银的来源和白银货币的经济效应	105
第二节 16~18 世纪中国铜钱问题	111
一 17 世纪中叶前的“钱荒”对策	111
二 从 17 世纪下半叶至 18 世纪的	
“钱贵”对策	137
第四章 16~18 世纪商业革命的效应	154
第一节 城市化新进程	154

一 江南的全国性经贸中心的出现	
——苏州的繁荣	154
二 大运河和长江沿线——临清与重庆的繁荣	160
三 “天下四镇”中的佛山镇和汉口镇	172
四 海港城市——天津、上海和厦门的崛起	185
第二节 商人社会地位的历史性变化	202
一 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促进商人资本的积累	202
二 儒商增多，商人素质提高	208
三 商人社会地位历史性变化	214
第三节 商业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中国	
资本主义萌芽	224
一 商业资本对劳动力吸纳的两种形式	224
二 16~18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商业革命的又一重要体现	231
第五章 这是一场未完成的商业革命	244
第一节 经济发展失衡，商业革命缺乏后劲	244
第二节 封建政权对商业资本的摧残和压制	249
第三节 没有发生资本原始积累	256
第四节 商业资本控制生产路狭窄	261

● 16~18 世纪中国商业革命

第六章 英国和荷兰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比较	267
第一节 英国从资本主义萌芽到近代工业化	268
一 英国手工制造业中资本主义萌芽	268
二 封建手工业行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成长	271
三 英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和乡村经济的变革	274
四 英国乡村工商业的发展与英国近代化的实现	281
五 资本原始积累：圈地运动和“血腥立法”	289
第二节 荷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病变”	294
后 记	304

绪 论

16~18 世纪中国商业革命和 资本主义萌芽

16~18 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曾经是 20 世纪下半期中国史学界的热门话题，也几乎成为定说。然而，这一定说如今却遇到挑战。挑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说，理由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①反对以五种社会生产方式斧削中国历史，从而否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②认为英国产业革命模式不具有普遍性，不适用于中国，明清时期中国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而走向近代化，因此资本主义萌芽不可能存在；③以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本身存在着缺陷，即主要是从生产方式本身的变化，特别是从雇佣劳动的变化，来验证资本主义的萌芽，因而被讥为：从战国至清代的两千年历史，各家各派都可以从中找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史证。挑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说的同时，立即就产生另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16~18 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变化了吗？是什么变化？这是需要回答的。

一 国内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发展与全国性市场的形成

我们以为，16~18 世纪中国发生了一场商业革命，尽管它是一种未完成的革命。这场商业革命体现的是：国内大宗商品

● 16~18 世纪中国商业革命

远距离贸易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扩张。

“商业革命”这一概念马克思用过，他所指的商业革命是：“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①从世界近代史来看，商业革命发生于工业革命之前。法国史学家保尔·芒图在他的《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一书中说：“贸易和生产的相互依赖，商业的扩张往往先于并决定工业的进步。”^②卡洛·M. 奇波拉主编的《欧洲经济史》也说，1550~1700年荷兰和英国“这场商业革命布下了许多最终导致工业革命的火种”。^③

马克思所说“商业的突然扩张”，在16~18世纪的中国就是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发展。中国远距离贸易古已有之。唐宋远距离贸易格局是以盐为主，粮食次之。16~18世纪这一格局有所变化，以布代替盐，成为远距离贸易的主要手工业品，而丝绸的长途贩运量也很大。手工业产品中棉布或丝织品，特别是棉纺织品在长距离贸易中取代盐而成为主要商品，其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远非盐所能及的。盐虽然也是手工业产品，但在当时主要用于食用，其经济链有限。棉、丝织品大量卷入市场，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正如吴承明先生所指出：“大约从明后期起，民生用品代替奢侈品和土特产品，成为长距离贸易的主要内容。我国国内市场也从这时起，有了真正的扩大。”^④

还应当指出，16~18世纪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是徽商、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372页。下引此书，同此版本。

② [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杨人、陈希秦、吴绪译，商务印书馆，1983，第67页。

③ [意]卡洛·M. 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2卷，贝显、张菁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4页。

④ 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晋商、闽商、粤商、江右商、洞庭商、山东商、龙游商等商帮的众多商人的行为，与以往个别商人的经营活动，已不可同日而语。

国内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使大宗商品在不同的经济区内得以交换，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经贸区。^①

江南经贸区是在江南便捷的交通条件和发达的丝织业、棉纺织业等基础上形成的。江南地区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特点是：向全国输出的主要是相对高值的丝、棉纺织品；而江南从全国输入的则是低值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如粮食、大豆、蓝靛、木材、纸张等。

16世纪以来，珠江三角洲经贸区，除对外贸易外，国内的长途贩运有两条线路：一是通过西江展开与广西的贸易；二是通过北江、东江和韩江开展与江西、湖广、福建以及江南等地的远距离贸易。

16世纪以来，首先，四川的商业中心从成都移至重庆，居于长江上游的重庆成为进出西南以及西南沟通长江中游的商品集散地。其次，长江中游汉口崛起，成为沟通长江全线与大江南北的贸易中心点，长江中上游经贸区因而形成。除重庆、汉口之外，该经贸区重要的贸易中心还有沙市、芜湖、九江等。这一个经贸区的特点，是以过境贸易为主，商品以粮食为大宗。

华北经贸区是依靠水陆交通连接而成，以生活资料贸易为主，包括京师和北直隶、山东、河南和山西在内的经贸区。北京是典型的消费型城市，城中聚集大批达官贵人、士兵及商人。进入北京市场的主要是生活消费品，特别是粮食和煤，因而形

^① 参见朱大为《16~18世纪中国远距离贸易和全国性大市场的形成》，《福建论坛》2003年第6期。

成了以生活资料单向输入为主的格局。除北京之外，明后期至清前期，华北最繁荣的商业都会是临清。临清不同于北京，它位于会通河和卫河交汇处的山东西北部，水陆交通两便，是作为远距离大宗商品贸易的枢纽而出现的，是华北经贸区最重要的商品转运中心。临清过境的最大宗远距离贸易商品是粮食。

西北经贸区指的是，东起北直隶西北部的宣镇，沿长城迤西，过张家口，直到新疆巴里坤等地，北伸则进入蒙古草原，直至清俄边贸城恰克图。这片广袤的土地没有其他经贸区那样便捷的交通条件，但在“一收十利”丰厚利润的驱使下，不少商人长途跋涉进入西北经商。明代中后期，西北贸易区具有明显的军事贸易特征：以商人与边塞驻军的贸易为主，辅以汉族商人与少数民族的贸易。形成于明中叶的西北经贸区，与明朝的军事布局有密切关系。为防御蒙古族统治集团对西北的军事袭扰，明王朝陆续沿长城军事要地设置九大军事防区，通称“九边”，亦即九镇。除了辽东镇，其他八镇均在西北经贸区范围内。降至明后期，募兵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有的征兵制，年例银即军饷补贴取代屯粮供给，从而导致军士手中有了更多的饷银可以购买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边镇巨额军饷对明王朝来说是沉重的财政负担，对西北贸易区而言是货币投放量的增加，从而促进了西北经贸区的发展。清代西北驻军增减无常，西北贸易区中军事贸易成为临时性。这迫使商人贸易战略转移，一部分商人转向内地，离开西北贸易区；另一部分商人则依然留在西北，向着边蒙贸易或与俄罗斯的恰克图贸易发展。

上述五个经贸区，并没有覆盖中国所有地区。但是，五个经贸区之外的许多地区的产品也大量进入各个经贸区，商人更是在每个经贸区的市场上大显身手。如福建在江南经贸区之外，但是，福建手工业原料如蓝靛、竹木、纸、糖等，却源源不断

地输往江南。福建作为缺粮区，每年都要从广东、浙江以及台湾输入大量粮食。湖南也在长江中上游经贸区边缘，但它与该经贸区以及其他经贸区关系也十分密切，尤其是湖南米，销往江南各地。湖南是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乾隆强调“湖南熟，天下足”。^①江西也是处于五大经贸区之外，但江西大米大量输往江南、广东和福建。景德镇瓷器更是各经贸区的畅销商品。江西广信府所产的纸贩之四方。万历《铅书》卷一“食货”记载表明，明中叶在江西的铅山市场上，几乎可以见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种种商品。降至清前期，东北与关内各个经贸区特别是华北经贸区经贸关系加强。东北盛产大豆、高粱以及棉花，每年都大量海运至华北与江南销售。此外，台湾与内地粮食、糖和手工业品交换；云南、贵州与内地之间铜、铅等矿产与手工业品交换，也频繁发生。五个经贸区之间，五个经贸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使全国范围内各层次的市场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网络。商品流通的规模，无论是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均前所未有。全国性大市场从而形成。

二 海外贸易的扩张，中国是当时世界范围商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16~18世纪，中国海外贸易的扩张，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 对外贸易额增加

从隆庆至明末，明王朝部分开放海禁，海外贸易有了长足发展。从顺治十二年（1655年）降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朝虽屡次颁布禁海令或迁海令，但海外贸易却未被扼杀。特别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之后，海外贸易更是飞速发

^① 王先谦《乾隆东华续录》卷二，光绪十年刊本。

● 16~18 世纪中国商业革命

展。据学者统计，从崇祯十四年（1641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中国驶往日本的商船共1711艘，年均10.7艘左右。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中国驶往日本商船共3017艘，年均41.4艘。^①明末清初，中国到东南亚商船年均91艘左右。^②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到中国贸易的英美商船有312艘，其中英国商船最多，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为58艘。进口商船数量增多，意味着进口贸易额增加。据黄启臣先生研究，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全国海外贸易总值为约100万两。乾隆十年（1745年）粤、闽、江、浙四港贸易总值高达3657余万两，而南宋海外贸易总量值不过500万两。^③

2. 海商势力壮大，郑氏集团控制了东南制海权

16世纪中叶以降，在中国东南沿海相继出现许多从事武装贸易的海商集团。而17世纪郑芝龙特别是其子郑成功崛起，更是取得东南沿海上贸易的垄断权。1650年郑成功占领厦门、金門两岛后，就积极拓展和日本、吕宋、暹罗、交趾等国贸易。其时，中国各地土特产通过厦门外销，各国产品也多经厦门入口。据学者估算，郑成功从对外贸易的收入中，每年获利可得70万余两银。^④郑成功发展海外贸易不仅是在对内反海禁，更是在对外反侵略斗争中进行的。特别是荷兰殖民者不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还在海上劫我商船，掳我百姓及商品，威胁郑成功海外贸易的安全。郑成功为反击荷兰殖民者的海盗行为，

① 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②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第263页。

③ 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④ 韩振华：《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第207页。

1655 年下令禁止对荷兰人通商，并于 1662 年把荷兰殖民者赶出台湾。郑氏还建立一套以征收关税为主要内容的外贸管理制度。在郑芝龙时代，郑氏集团雄居海上，向来往东南沿海的海船征收过往税：“凡海船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船例入三千金。”^① 降至郑成功时期，将海船过往税改称为“牌饷”，大船征 2100 两，小船征 500 两，然后给船只“牌照”，每年一换。降至郑经时代，1672 年 10 月，郑经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缔结条款，其中规定该公司应纳输入售货款 3% 的关税。对于这个条款，学者指出：“它的出现标志着旧的市舶制度已经结束，新的海关税收制度已经开始产生。”^② 总之，郑成功不愧是当时中国商业革命的先驱。

3. 对外贸易及港口数量增加

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开海之前，浙江有双屿等港口，福建有漳州月港，晋江安平港，诏安梅岭港，广东有澳门和南澳港，台湾有澎湖、大员和鸡笼、淡水港等，是为海上私人贸易港口。康熙二十三年海禁取消，北起辽宁南至广东，大小港口计有一百多处，它吸引着世界各国商船赴华贸易。“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都与中国发生了直接贸易的关系。”^③

4. 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商业革命

16~18 世纪，随着地理大发现，在西欧掀起商业革命的热潮。其时，中国对外贸易的拓展，表明中国也参入了这一场世界范围的商业革命之中，而且成了被西方人称为“是东南亚，

① 邹漪：《明季遗闻》卷四，上海图书馆藏，清顺治刻本。

②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第 313 页。

③ 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 年第 4 期。

● 16~18 世纪中国商业革命

老实说，也是遥远的国度的工厂”。^① 从中国输出的商品，有丝、棉、麻等各类纺织品，还有陶瓷器、茶叶、铁器、木器、竹器和各种农制产品，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出超的地位。中国是当时世界范围的商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16~18 世纪中国商业革命的社会经济效应

16~18 世纪的中国商业革命产生诸多社会经济效应。效应之一是：导致了中国城市化的新进程。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利润丰厚。高利润促使商业资本向着贸易中心点集中，从而使一些贸易中心点迅速城市化。16~18 世纪，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苏州成了全国性中心市场，推动苏州向着工商业城市发展。也是因商业资本的集中，在运河沿线，有临清、济宁、淮安等一批商业都会兴起；在长江和珠江沿线，有汉口、重庆、佛山等一批商业都会兴起；在沿海则有天津、上海、厦门的崛起。这一批城市的兴起，并非传统的政治因素，不是像以往那样，由于达官、贵人或士兵的相对集中，即消费人数多诱发了城市繁荣，而是由于商业资本集中，物流量增大而诱发城市繁荣。我们知道，商周时，一个城只设一个市，供人们交易。《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左祖右社，西朝后市。”秦汉时随着商业发展，城中的市也逐渐增多。班固《西都赋》说：“九市场开，货别隧分。”西汉时，长安城内已有九市。市场扩大，这可以看作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第一阶段。隋唐直至宋，不仅坊市隔绝制度被冲垮，临街设肆成大都

^① [英] 巴素：《〈东南亚之华侨〉初版绪论》，《东南亚之华侨》上册，第 11 页，转引自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2001，第 73 页。

会的普遍风貌。这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第二阶段。但是，在16世纪以前，中国古代的城市基本上都是消费性城市。消费是以达官、贵人、士兵或城居地主为主。因此，城市的规模，其繁荣程度，总是由上述人物的聚集数量而决定的。京师，有皇室，有中央政府各衙门，有拱卫士兵，还有许多文人、富豪，消费者是全国之最，城市的繁荣也是全国之最。除京师之外，其他城市的繁荣度依次是省治、府治、州治与县治。城市繁荣度呈现出政治行政序列特征。降至16~18世纪，情况发生变化。如苏州本来只是一个府治所在地，竟然成为全国中心市场之一；临清以一个州治所在地，成为华北商业重镇；汉口与佛山本来只是“镇”，但汉口繁荣不亚于湖北省会武昌；佛山商业繁荣可以匹敌广州；重庆以府治所在，成为西南重要商埠；天津与厦门都是从军事卫所所在地，一个跃为华北贸易大港，一个成为闽南地区贸易大港。这些城市的崛起，靠的不是政治行政力量，而是商业资本与商品的集中量。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已进入了一个以商业资本集中程度来决定城市繁荣的新阶段。

效应之二是：商人社会地位发生历史性变化。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丰厚利润，成就了一批富商巨贾。如嘉靖时，歙人许谷，“贩缙航海，而贾岛中，赢得百倍”。^①这是长途贩丝绸而获得高额利润的例子。韩大成在《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中，曾列出从成化、正德至崇祯年间30多位从事长途贩运富商巨贾的情况。这些富商巨贾的出现，表明16~18世纪，中国商人经济实力的增强。在富商大贾中，

^① 《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九《许本善传》，转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第432页。

● 16~18 世纪中国商业革命

“儒商”人数明显增多。休宁人戴震说，当地商人，“虽为贾者，咸近士风”。^①“儒商”的增多，提高了商人素质，援儒入商，不仅提高了商业竞争水平，也使商业经营作风儒家道德化，商人社会责任心加强了，还产生一批商人文化。第一，儒商运用传统的商业文化参与市场竞争。中国从春秋战国至明清，商品经济和商业逐步的发展，创造一套商业文化。16~18 世纪的“儒商”，把中国古代这一套远距离贸易的经验，奉为圭臬，尊崇子贡、范蠡、猗顿等富商为典范，所谓“习计然之策”。如徽商章策，“精管（仲）刘（晏）术，所亿辄中，家日以裕。”^②晋商王现“善心计，识重轻，能时低昂，以故饶裕。”^③第二，援“儒”入商，使商业经营儒家道德化，把“诚”、“信”、“义”等作为经商准则，薄利竞争，甘当“廉贾”。如新安某人从小经纪发展为富商，他对人说：“求富不难，汝等先治其‘外贼’，后治其‘内贼’。”^④他所谓“内贼”，指的就是要管好喜色的“眼”、好音乐的“耳”、喜香的“鼻”、喜味的“舌”、喜穿的“身”，实践“仁、义、礼、智、信。”一个商人竟能以宋明理学所倡导的行为准则援入经商之道，可见当时商家受儒家道德规范的影响之大。商人素质的提高，集中表现是商人社会责任心加强。16~18 世纪，一些商人，特别是儒商，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如修桥、筑路、治水、赈济等等。徽商还在明中叶抗倭斗争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嘉靖三十四年（1555 年）七月：倭寇流劫芜湖，当地“各商民义勇登屋，以瓦石灰大无礮

① 戴震：《戴东原集》卷一二《戴节妇家传》。

② 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二六《例授儒林郎候选布政司理问绩溪章君策墓志铭》，转引《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 453 页。

③ 李梦阳：《空同集》卷四六《明故王文显墓志铭》。

④ 沈起凤：《谐铎》卷七“鄙夫训世”。

击之，贼多伤者，遂奔去”。^①

富商大贾的增多和商人素质的提高，使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历史性的改变。唐宋以来，中国传统的贱商、轻商观念有了明显的变化。北宋范仲淹疾呼：“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②南宋陈耆卿更把商业从“末业”提高作“本业”，把商勤于做生意而“积财货”和士勤于学业而得“爵禄”^③相提并论。降至16~18世纪，商人经济实力的增强导致了商人社会地位更大的变化。

第一，恤商的观念从思想家的认识，发展到掌权者的认识，从社会舆论发展到政策措施。如明万历时，内阁首辅张居正就提出“厚商而利农”^④的主张，他是看到了当时商业发展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实际效益。清康熙皇帝多次提出要“恤商”，“利商便民”，说“朕思商民皆我赤子”，应“除害去弊”^⑤。乾隆对商人在流通中的作用有所认识。说，“至于商贾，阜通货贿，未尝无益于人”。他明确反对贱商，说，“商众即吾民也，朕心岂有歧视”，^⑥否定了通过增加关税以节余部分作为官吏养商银的主张，告诫官吏“但当以清弊恤商为本。”^⑦当“恤商”观念还只是思想家的舆论时，对商人来说，只是口惠而无实。而发展至掌权者的认识与政策措施，商人的社会地位才能得到真正的改善，收到实际利益。

第二，商人自我保护意识加强，从以往托求权贵庇护，发

① 《明世宗嘉靖实录》卷四二四。

② 范仲淹：《范文正集》卷一《四民诗》。

③ 嘉定《赤城志》卷三七《风土门·土俗·重本业》。

④ 张居正：《张太岳先生文集》卷八《赠水部周汉浦稚峻还朝序》。

⑤ 《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六《征榷考》。

⑥ 《清高宗乾隆实录》卷五，雍正十三年十月下。

⑦ 《清高宗乾隆实录》卷九，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下。